

# 弑父情节与上帝的存在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神学解读

姜桂栩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弑父情节负载着复杂的哲学神学内涵。在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基于“约伯的困惑”展开关于上帝存在的思考;以“假如上帝不在”的逻辑结果否定了对上帝的理性证明,反证了上帝存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进而昭示了通过爱、通过信仰超越生存困境的拯救之路。小说反映了19世纪俄罗斯社会最深刻的信仰危机与心灵焦虑以及寻求精神家园的苦恼。

**关键词:**《卡拉马佐夫兄弟》; 约伯; 困惑; 上帝; 存在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839(2004)06-0018-08

## The Patricide Plot and God's Existence ——A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rothers Karamazov*

JIANG Gui-xu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Shandong University, Jnan 250100, P. R. China)

**Abstract:** The patricide plot in *The Brothers Karamazov* carries complicated philosophical and theological connotations. In this novel, Fyodor Dostoyevsky develops his thoughts on God's existence based on Job's bewilderment; he denies the rationalistic arguments for God's inexistence with the logical result of the hypothesis that God doesn't exist, which in turn confirms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God's existence; moreover, he declares the way of salvation through love and belief to surpass survivorship. The novel reflects the deepest belief crisis, spiritual anxiety and affliction of seeking spiritual homestead in Russian society of the 19th century.

**Key words:** *The Brothers Karamazov*; Job; bewilderment; God; existence

《卡拉马佐夫兄弟》<sup>①</sup>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思想探索的总结,它讲述了一个弑父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贯穿在小说各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那个我有意无意之间为此苦恼了一辈子的问题——上帝

收稿日期: 2004-06-02

作者简介: 姜桂栩(1946-)女,山东平阴人,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教授,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耿济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文中引文均用该版本。

的存在。”<sup>[1]</sup> (第335页)的确,《卡拉马佐夫兄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写实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不是因为杀人故事吸引人而描写它,作者设置弑父情节是为了探讨他所说的“上帝的存在”问题。因此,小说中的弑父情节负载着复杂的哲学神学内涵;在小说情节与人物的对话中,充满了宗教神学的抽象思辨。所以,对《卡拉马佐夫兄弟》进行神学解读,也许正是把握《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思想真谛,从而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情怀的必要冒险。

## 一、约伯的困惑

别尔嘉耶夫说:“人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问题——是关于上帝的问题。”<sup>[2]</sup> (第231页)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小说中的所有人物,上至教会长老,下致普通百姓,每一个人都像哲学家一样苦苦思索着上帝存在的问题,并都为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而苦恼。

卡拉马佐夫的二儿子伊凡是个无神论者,宣扬“上帝不在,百事可为”的理论,但是,上帝存在的问题在伊凡的心里并没有彻底解决,还在折磨着他。因为他既不相信灵魂不死,又不相信自己写的那些言论。所以,当老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斯美尔佳科夫在他的理论影响下杀死了父亲后,他的精神陷于崩溃。卡拉马佐夫的长子德米特里酗酒、放荡,与父亲争夺情妇,侮辱自己的未婚妻,在可耻的堕落中自得其乐,但对上帝的信仰又使他为自己的卑劣痛悔不已。老卡拉马佐夫自私、残忍、放荡而又无耻,他与长子德米特里演出了一场争夺情妇的闹剧,但就连这样一个恶魔式的人物也在思考着上帝存在的问题。他说:“我无论怎样愚蠢,对这类问题,总还是思索的,自然是偶然想一想,不是永远想。”他自知罪孽深重,以特有的方式思考着自己死后灵魂是否被钩子钩走的问题,他问儿子们:“假使上帝是有的,存在的,……我自然不对,应该受过。假使根本没有上帝,那么还要他们,要你的那些神父干什么呢?……这一切都使我的心里苦恼。”三儿子阿辽沙诚实善良,渴望真理,信仰上帝,但是他在与伊凡的争论中也常常表现出困惑与疑虑。他奔走于父亲、哥哥、受屈辱的人们之间,倾听每一个人的诉说,想化解父兄间的仇恨,给受伤的人以安慰,但他时时感到软弱无力:“这样能使他们团结吗?”卡拉马佐夫一家到修道院里是为了解决老卡拉马佐夫与长子米沙的争执,但实际上到场的所有人谈论的中心话题乃是信仰上帝的问题。例如修道院长老说,谁十分幸福,谁就在世上履行了上帝的约言。残疾儿丽莎的母亲问长老:“幸福究竟在哪里?”“我的痛苦是……没有信仰。”“我觉得来世是一个谜!……谁也不能解开这个谜。……关于来世的这种念头使我不安到既痛苦、又害怕、又恐怖的程度。”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装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小说由此笼罩着一片唯恐失去上帝的惊慌、焦虑与困惑的情绪。这种情绪是19世纪俄罗斯社会精神危机的反映,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怀疑精神的真实写照。

众所周知,俄罗斯是个信仰东正教的国家。自从公元10世纪末基辅罗斯公国皈依基督教以来,俄罗斯民族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东正教“成了俄罗斯人精神的基础”<sup>[3]</sup> (第10页)。“东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俄罗斯人把莫斯科称为第三罗马,认为世界精神生活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俄国。”<sup>[4]</sup> (第6页)巨大的使命感和神圣感使信仰与道德在俄罗斯人民的心目中既有终极意义也具有实践价值。对俄罗斯人来说,基督教信仰不仅仅是一个宗教问题,而是承载了社会、道德、人性等多层面的复杂内涵。但是,19世纪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引发的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使整个俄罗斯社会四分五裂,危机四伏。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我们这里开始了一个普遍‘隔绝’的时代。大家隔绝、孤立,任何人都企图创造出自己的、新的、前所未闻的东西。任何人都舍弃了原先思想和感情中共同的东西,并从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开始。任何人都想从头开始。他们毫不惋惜地割断了原有的关系,每个人都自由行动并仅仅以此感到欣慰,……同时,无论在什么问题上几乎不存在道义上的一致;一切都四分五裂,而且甚至不是四分五裂成小团体,而是成了个体了。”<sup>[1]</sup> (第188-189页)“我们的社会没有基础,没有形成行为准则,因为根本不存在生活。巨大的震荡,一切都停顿了,一切都在衰败,似乎一切都被否定和不存在。而且不像西方只限于表面,而是在内部,在道德上。”<sup>[1]</sup> (第373页)在这种情形下,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运动日渐高涨,知识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西欧主义、斯拉夫主义等各种理论学说的论争也纷纷扬扬。各种社会思潮尤其是无神论的强烈冲击,使俄罗斯传统的价值体系陷入困境,上帝存在的自明性

受到怀疑,从而使“上帝是否存在”的话题成为当时的时代难题。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两个主要人物伊凡与阿辽沙有一次见面时,伊凡对阿辽沙说,我们见面不是为了谈父亲哥哥的具体问题,“我们首先需要解决永恒的问题,这才是我们所关心的。所有俄国的青年人现在全一心一意地讨论永恒的问题”。“俄国的小伙子,……他们就聚集在这里的脏酒店里,坐在一个角落上。他们以前从来不相识,……你看他们在讨论些什么?讨论的不是别的,而是全宇宙的问题:有没有上帝?有没有灵魂不死?而那些不信上帝的,就讲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还有关于怎样按照新方式改造全人类等等,结果还是一码事,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今天在我们这里有许许多多极不寻常的俄国小伙子都在一心一意地谈论永恒的问题。”阿辽沙也同意,说:“是的,在真正的俄罗斯人心中,有没有上帝,有没有灵魂不死的问题,或者如你所说另一面的问题,自然是最首要最严重的问题,而且这也是应当的。”这段话非常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也非常明确地说明了对俄罗斯人来说,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是关系到他们的生存与生活的根本问题。在这样的文化境遇里,信仰问题成为19世纪俄罗斯作家们在寻求“怎么办”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宿命。因此,当时许多作家都用各自的方式对宗教信仰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回应,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小说《怎么办》中描写了他理想中的新人的新道德“合理利己主义”;列夫·托尔斯泰宣扬上帝活在每个人的心里,倡导用“托尔斯泰主义”作为拯救俄国的药方等等。由此可以看出,“上帝存在问题”是俄罗斯的时代主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上帝存在的思考是他对俄罗斯向何处去作出的回应。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可能像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作家那样,为俄国的未来和人们的道德重建开出一个明确的药方,主要原因就在于上帝是否存在不仅是时代的难题,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人的难题。

182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娜·德·冯维辛娜的信中有一段话:“我向您谈谈自己,我是时代的孩童,直到现在,甚至(我知道这一点)直到进入坟墓都是一个没有信仰和充满怀疑的孩童。这种对信仰的渴望使我过去和现在经受了多么可怕的折磨啊!我的反对的论据越多,我心中的这种渴望就越强烈。可是上帝毕竟也偶而赐予我完全宁静的时刻,在这种时刻我爱人,也认为自己被人所爱,正是在这种时刻,我心中形成了宗教的信条,其中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明朗和神圣的。这一信条很简单,它就是,要相信:没有什么能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可爱、更智慧、更坚毅和更完善的了。不仅没有,而且我怀着忠贞不渝的感情对自己说,这决不可能有。不仅如此,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且确实真理与基督毫不相干,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sup>[1](第297页)</sup>他渴望对基督的信仰,但又对此充满了深深的怀疑;尽管怀疑他却还推崇基督的完美。在督信东正教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时代思潮的撞击下,个人的信仰出现了危机。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指出的:“作为一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算不上一个主人。他的个性的解体,他的个性的分裂,他想相信的东西却不能给他真正的信仰,他想否定的东西却经常使他狐疑不决——这一切使得他主观上适宜于做一个充满痛苦而又不可缺少的喉舌,来表现自己时代的不安。”<sup>[5](第69页)</sup>

陀思妥耶夫斯基极端矛盾复杂的心态是充满怀疑与变数的时代在他心灵上的投影,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的个性与经历的思想情感积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第一部小说《穷人》中,已经表现出对人的心灵的关注热情,不过,那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侧重于对小人物心灵善的开掘。在西伯利亚流放地,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了太多的罪恶,看到了人类心灵中的黑暗深渊。在《死屋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了大量的以折磨别人、侮辱别人取乐的恶魔,如宰杀小孩的蜘蛛式怪物加辛、以惩罚犯人为乐的淫虐狂少校等等。许许多多善良的人就在这些恶人的折磨下受苦受难。这使窥探到人类心灵黑暗深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感惊骇与绝望:“很清楚和十分容易理解,藏匿于人类中的恶比包医百病的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要深得多,没有一个社会制度能避免恶,人的心灵不会改变,不合理和罪恶源自人的心灵本身,最后,人的心灵的活动规律还很不清楚,科学对其很不了解,它们很不确定和神秘,所以说不可能有医生,甚至不可能有最后的评判者,而只存在道出‘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那一位。”<sup>[1](第244页)</sup>所以在流放归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通过革命手段改造社会的理论产生了怀疑,他把注意力更多地投放在了探讨人的心灵之恶以及道德重建上,并且把社会得救寄托在人得救上。然而,人如何才能得救?上帝真的存在吗?如果上帝存在,为什么他不制止犯罪?成千上万无辜的人为什么受苦?上帝创世的意义是什么?社会存在这么多

的不公正,正义何在?如果上帝不存在,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的行为准则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折磨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使得他日夜不宁,苦恼万分。面对人的心灵深渊与社会的罪恶现实,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不对心中的全能者发出诘难。也就是说,“正是人生的苦难引起了他对上帝存在问题的思考”<sup>[3](第37页)</sup>。类比《圣经·约伯记》中的约伯因个人遭遇的不公和社会之恶向上帝发出质疑,可以说,“约伯式的困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上帝的存在”作为小说对话中心话题的主观动因;“约伯式的困惑”也是小说人物对上帝存在问题进行讨论的逻辑起点。

## 二、假如上帝不在

于是,围绕上帝的存在问题,小说中的人物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对话与交流。双方的代表人物就是伊凡与阿辽沙。

伊凡在杂志上写文章说,“人爱人类”的自然法则根本就不存在。世界上如果有过爱,那是因为人们相信自己的不死。如果人们对自己不死的信仰被打破,立刻就会陷入绝望,那时也就无所谓不道德,一切都可以作,甚至吃人肉的事也一样。“假使没有不死,就没有道德。”伊凡以恶的存在为理由断然否定了人类之爱,否定了灵魂不死的信仰,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上帝存在的意义。阿辽沙是一个心地纯洁善良的虔诚修士,为了拯救世界,他肩负着佐西马长老的嘱托,离开修道院,在世俗的人们中间传播福音。自私、贪婪的老卡拉马佐夫与长子德米特里为了争夺一个情妇互相仇视;德米特里的未婚妻卡捷琳娜受伤的自尊心一再受到伤害;格鲁申卡怀着曾被抛弃的怨恨玩弄着耍弄别人的游戏……面对这样一个充满罪恶的混乱世界,阿辽沙保守着自己的信仰,用一颗宽容博大的心对待每一个人,给予他们精神安慰,希望他们消除仇恨,彼此和解。这些人也把阿辽沙当作知己,向阿辽沙倾诉自己的不幸和烦恼。阿辽沙的信仰与伊凡的理论形成了尖锐的对峙,他们彼此注视着对方,内心进行着紧张的对话。伊凡抗拒着阿辽沙的上帝,阿辽沙为伊凡内心深处隐秘的弑父念头而悲哀。他们固守着自己的理想,谁也不肯向对方投降。有一次,老卡拉马佐夫追问两个儿子,让他们确切地、认真地回答:到底有没有上帝?伊凡说:没有上帝。阿辽沙说:有上帝。老卡拉马佐夫又追问:有没有灵魂不死的事?伊凡说:没有,一点也没有。阿辽沙说:有,有上帝,也有灵魂不死,灵魂不死就在上帝里面。伊凡认为父兄二人撕打,是“一条毒蛇咬另一条毒蛇,两个人都是活该”。阿辽沙问伊凡:“哥哥,……难道每个人都有权利决定别的人谁值得活下去,谁不值得再活下去吗?”伊凡认为人们在决定这些事情时根据的不是价值,而是更直截了当的原因,也就是不是根据抽象真理,而是根据现实。他不承认普遍真理的存在,不承认上帝的存在。没有上帝的世界是冰冷而残酷的,伊凡的回答令阿辽沙不寒而栗。

伊凡与阿辽沙的观点针锋相对,到底哪个是真理?

如前所述,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给世人指导迷津的导师,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寻求者,是一个充满重重疑虑的困惑者,一个向上帝发出诘难的约伯。阿辽沙虽然是他的理想人物,他希望用基督的爱拯救世界,但上帝是否存在?基督的爱能否拯救世界?他希望但不能肯定,他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一种可能。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把他的理想当作处方塞给读者,他只是把他们放在冷酷的现实中,并且按照各自的理论逻辑设计出极端的处境,让“演出的参加者”“都站在边沿上(在生与死的临界线、谎言与真理的临界线、理智与疯狂的临界线上)”,<sup>[3](第207页)</sup>让他们与各种思想意识碰撞,平等地对话,探讨各自的意义与价值,考察各个思想意识的种种可能性。于是,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他设计了一个特殊的情景——弑父。

伊凡·卡拉马佐夫推崇理性和人的自由意志,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也就是说,他认为人类没有先验的最高价值判断标准,人可以凭借理性原则判断是非善恶,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上帝不存在,百事可为。按照这个逻辑,任何人都可以杀死作恶的人,儿子杀死作恶的父亲就是一种可能。果然,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在伊凡理论的启发下杀死了父亲老卡拉马佐夫。老卡拉马佐夫是个淫棍、小丑、恶魔,按照伊凡的理论,这种毫无理性的恶魔当然是没有生存价值的,但是,父亲是生命之源,儿子是父亲生命的延续,无论父亲是好人或是坏人,无论上帝是否存在,弑父都违背了人类最基本的自然生存法则。斯麦

尔佳科夫的弑父行为践踏了人类的生存法则,预示着人类的毁灭。因此,当伊凡知道是斯麦尔佳科夫杀死了父亲之后,便产生了深深的负罪感,他认识到是“百事可为”的理论唆使斯麦尔佳科夫杀死了父亲,自己才是弑父的真正凶手。伊凡想通过彻底否认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以追求绝对的个性自由,殊不知没有道德约束的绝对自由只会导向恶的结果。他的理论大厦在人类生存法则面前碰得粉碎,伊凡的精神崩溃了。在这里,实际上是作者在运用情节与人物对话,他在逼问伊凡:人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吗?“百事可为”的理论真的可以拯救世界吗?作者设计的弑父情节虽然有特殊性,但是普遍寓于特殊之中,也就是说,违背普遍性原则的理论不是真理。由此可以看出,作者设计弑父情节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批判伊凡这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向人们演示“假如上帝不在”的后果。老卡拉马佐夫被杀死后,阿辽沙对伊凡说:“杀死父亲的‘不是你’!…是上帝指示我对你说这句话的。”阿辽沙这是在说,杀死父亲的是伊凡的理论,而不是作为人的伊凡,因为伊凡是怀着社会良知在探索真理,正如巴赫金指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主要人物,作为思想的人,是绝对的无私,因为思想确实支配了深藏在他们身上的个性的核心。这种无私,不是他们作为描绘对象的个性特点,也不是对他们行为的外在评价;这种无私表现出他们真正的生活于思想的领域(他们‘不要百万家产,可要弄明白思想’),思想性和无私似乎成了同义语。在这个意义上,杀死并抢掠放高利贷老太婆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是绝对无私的;妓女索尼娅是绝对无私的;杀父的同谋者伊万是绝对无私的。”<sup>[1]</sup>(第132页)正因为如此,阿辽沙认为上帝是会宽恕作为一个人的伊凡的。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作者在这里否定的不是伊凡这一个人,而是一种理论。他把老卡拉马佐夫描绘成一个恶棍更说明了这点。

可以看出,对于伊凡的无神论挑战,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沿用伊凡的理性逻辑论证上帝的存在,而是采用反题的方式对无神论进行辩驳:通过“假如上帝不在”的逻辑后果反证上帝存在的必要性。在这里,论证方法获得了价值论意义。虽然由此生发的对上帝的信仰不免带有实用主义色彩,但小说情节向人们演示的逻辑结果却是无可辩驳的。

然而,伊凡理论的失败并不意味着阿辽沙信仰的胜利。阿辽沙的博爱原则同样无情地受到了现实的挑战。他的宽容与博爱虽然能给予人们精神安慰,却无力改变他们的现实处境,更没能阻止弑父事件的发生。在与伊凡的对话中,他的信仰也不是总能占上风。

伊凡与阿辽沙的一次大讨论,把阿辽沙逼到了角落。伊凡说:“我不是不接受上帝,我是不接受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而且决不能答应去接受它。”“我一直想不通怎么能爱自己的邻人。”因为人比野兽还残忍。他讲了一个故事:土耳其人用刺刀从母腹中剖出婴孩,再当着母亲的面把婴孩刺死。对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去爱?“有人说,没有这个人就不能活在世上,因为那样他就会分辨不出善恶。但如果分辨善恶需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们又要这该死的分辨善恶干什么?因为我们的全部认识也不值这婴孩向‘上帝’祈求时的一滴眼泪。”“假使大家都该受苦,以便用痛苦来换取永恒的和谐,那么小孩子跟这有什么相干呢?请你对我说说!我完全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也应该受苦?”无论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面对血淋淋的残忍,面对受苦的儿童,谁的心里不滴血呢?面对这样的逼问,阿辽沙对于上帝存在的信仰显得那么虚幻!事实上,伊凡对阿辽沙的逼问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我追问;这追问里透露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痛苦万分的心声,显现出他神情专注的焦虑目光。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提出了一个艰难的神学命题:神正论。上帝至善的信仰与恶的存在构成了不可调和的悖论,这是基督教神学中一个永恒的难题。按基督教的观点,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是至善至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那么社会中的恶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关系到对上帝的信仰,因为这是每一个走向上帝的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历代神学家、哲学家都试图对这个问题作出解答并为此争论不休。有的认为恶是上帝理念的一部分,上帝造恶是为了彰显善,是对人的考验;有的认为恶起源于人滥用了自由意志。对于前一种学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断然予以否定的,因为他认为基督是世界上“绝对美好的人物”<sup>[1]</sup>(第326页),任何毁损上帝美好形象的说法他都是不能接受的。他基本上倾向于认同后者,但又心存疑虑。如伊凡所说,儿童是绝对纯洁的、无辜的,他们还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意愿,还没有运用自由意志的能力,如果说《约伯记》把受苦的意义阐释为上帝对人的考验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在伊凡讲述的故事中,孩子的眼泪则抹去了上帝作为绝对道德标准的价值,使受苦的意义荡然无存。而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

就存在儿童受难的现象，伊凡的例证把阿辽沙的信仰置于了永恒的怀疑中。在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借伊凡之口不仅对上帝的存在发出质疑，也对历代神学哲学理论发出了质疑，由此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同寻常追问真理之勇气！

对于儿童受难的问题，小说中的阿辽沙没有作出正面回答，因为人类社会前进的脚步沾满了泥泞与鲜血，这是一个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而伊凡本人的故事却诠释了恶的根源。伊凡不认可社会法则的冷酷，认为上帝容忍恶的存在恰恰证明了上帝存在的不合理；他以现实中恶的存在为理由否定了上帝的存在，获得了自由选择绝对自由；他企图建产起以人的自由意志为中心的帝国，希冀靠人的理性消除罪恶，结果导致了弑父发生，这就意味着——恶产生于人的自由意志。就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自由又提出了质疑。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伊凡自身的逻辑揭示了“自我中心主义”的谬误，但他绝不是反对人的个性自由。恰恰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向推崇人的个性，反对社会对人的规定性，反对对人的个性的抹杀。他在《地下室手记》中借地下室人之口说，二二得四不是生活，而是死亡的开始。但另一方面，他看到了西欧理性主义泛滥造成的人的自大，看到了人的狂妄自大造成的严重后果，于是在伊凡的论题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提出了对个性自由的诘问：人的个性与自由是绝对的吗？这是地下室问题的反题。“上帝创造的人是自由的”，“没有自由就没有善”。<sup>[3]（第208-209页）</sup>自由是上帝赋予人的最好礼物。如果没有了选择的自由，人就成了机械的木偶，人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自由是人之为人的标识，自由是人的生命力保证。自由给人选择的权力，使人保持了个性。为了捍卫人的自由，捍卫人的个性，反对二二得四的理性主义现实对人的规定、对人个性的抹煞、对人的物化，人必须保持自由的个性。但自由也产生恶，因为自由选择有两个向度：善与恶。人的欲望、本能，原罪的趋向以及个性追求，趋向恶的选择；向善、寻求拯救的神性趋向善的选择。“魔鬼同上帝在进行斗争，而斗争的战场就是人心。”恶的存在不是上帝有意要考验人，也不是彰显善的必要，而是人背离上帝的结果。要保证人选择的价值趋向善，必须保持对上帝的信仰。“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 8: 32）有上帝的指引人才会选择正途，否则会走入迷途。伊凡的悲剧反证了上帝存在的必要性。至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恶的追问可以用别尔嘉耶夫的观点加以表述：“万物一统、世界和谐的理念根本不是基督教理念。基督教是冲突地、反一元论地对待个性的。上帝不创造任何世界秩序，在自己的创造中，他与存在毫无关系。上帝仅仅创造生存，创造个性，创造实现自由的课题。”<sup>[4]（第132页）</sup>

经过一圈的拷问与思辨，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又回归了传统。然而，经过拷问的思想却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在神正论问题上，没有人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提的苦难问题更为尖锐，没有人拥有他那样的力量去揭示这个问题包含的内在辩证法。”<sup>[4]（第136页）</sup>

但是，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面对孩子被害时，人应如何选择？

伊凡又讲了一件事：一个俄国的地主、将军，就因为农奴的小孩把他的狗的腿砸伤了，就当着母亲的面放狗把小孩活活撕成了碎块。伊凡问阿辽沙：将军是否应该枪毙？阿辽沙说：“枪毙！”伊凡又说，如果为了建造一座人类命运的大厦，最后造福人类，就要残害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生物——比如说一个小孩，阿辽沙是否愿作造这幢大厦的建筑师呢？阿辽沙回答：“不，我不能答应。”

阿辽沙的回答曾使许多人感到困惑。有人说这证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矛盾。不错，在这个问题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始终处于矛盾之中，西伯利亚的经历使他认识到用暴力惩罚无法改善人性之恶，由此他才一而再再而三地苦苦追寻上帝对人心灵的约束力。但从现实上看，对于人的行为之恶，如何对待？当恶人残害他人生命的时候，如果不用强力予以制止，难道不是任由恶为所欲为吗？上帝的法则不是二二得四的冰冷教条，而是爱，是怜悯，是公义，是有生命力的！是可以在人间实现的！在伊凡设定的情景面前，任何人如果再选择忍耐，那将不是美德，而是纵容罪恶！因此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阿辽沙的回答违背了上帝的原则。对《圣经》上“爱仇敌”的教义应理解为为仇敌祈祷，希望他悔改，是一种对同类的态度，博爱的态度，并非是让人爱罪恶、爱恶人；《圣经》讲无数次的宽恕是教人要“以德报怨”，意在对人进行道德感化，并非姑息纵容罪恶。惩罚恶行，宽恕罪人，应是《圣经》之要义。因此，阿辽沙的回答不应看作是对暴力原则的认同，而应看作是对社会公义的认同；如果说阿辽沙的选择与伊凡达成了一

致,也正是这一价值点上。只不过惩治恶时遵循的标准应是上帝的法则,而不应是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人的自由选择是在上帝原则的关注下进行的,就应是善的。伊凡与阿辽沙的根本区别在于一个是无神论,一个是有神论。

在对上帝存在的思考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信仰与哲学、信仰与现实搅在一起,用现实问题印证抽象理论,又企图用抽象理论解决现实问题,岂不知现实是活的生活,现实中的问题犹如一团乱麻,明晰的抽象理论往往难以涵盖纷繁的现实。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天才的敏感感觉到了现实的混乱,在小说中也卓越地表现了这种混乱感,但遗憾的是他总想用明晰的理论加以解说,有时还不自觉地陷入极端主义,在思维方式上也是受到了他所批判的西欧理性主义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哀!在经过了怀疑与思辨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出的结论是:上帝是不能在因果逻辑关系中加以证明的!

### 三、上帝存在的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假如上帝不在”的逻辑后果反驳无神论者对上帝存在的否定,由此反证了上帝存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所以,在否定了对上帝的理性证明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必须作出回答:上帝是否存在?如果存在,上帝在哪里?人如何认识上帝?应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十分肯定的,即上帝不在人的理性逻辑思辨中;上帝在生活里,在人心中,也就是说,上帝是超验的存在,是人生存的意义。

斯麦尔佳科夫在弑父之后与伊凡有一段对话:“做了?那么难道真是你杀的?”伊凡觉得一阵浑身冰冷。……“你知道么:我怕你是一个梦,你是坐在我的面前的一个幻影。”他喃喃地说。“这儿什么幻影也没有,只有你我两个,此外还有一位第三个。这第三个人,他现在显然就在我们两人中间。”“他是谁?谁在这里?第三个人是谁?”伊凡·费多罗维奇惊惶地问道,环视着四周,眼睛匆促地向四个角落里搜寻什么人。“第三个人就是上帝、天神,它现在就在我们身边,不过不必找他,您找不到的。”

斯麦尔佳科夫与伊凡的对话证明,上帝已先验地存在于他们的心灵结构中。这里的上帝的内涵也不仅仅是康德所说的先验地存在于人的心灵中的道德感,同时还是一种无所不在的超验存在,是人可以凭借体认感受到的神秘存在。但是,超验的上帝并不滥用神秘的力量,小说中描写佐西马长老死后尸体发臭,并没出现人们所期望的奇迹,说明上帝不存在于奇迹中;大法官的故事揭示了,上帝也不在宗教权威中。“上帝在‘局部’中显身,而非在‘整体’中显身,在特殊中显身,而非在普遍中显身。它不在世界秩序中显身,上帝与任何普遍的东西不相关联。它唯有在痛苦的个性抗击世界秩序,自由抗击必然性的时候,显露其真身。上帝在流淌泪滴的孩子身上,而不在以这一滴眼泪为抵押的世界秩序中。”<sup>[2]</sup>(第138页)也就是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不是信则有不信则无的“幻影”,而是仁慈、博爱、忍耐、牺牲,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是与苦难同在、给予人希望与勇气的最高存在!“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圣经·约翰福音》,14:6)上帝不改变已存在的社会现实,上帝只启示人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和道路。

小说最后,阿辽沙说:“我以为,世界上大家都应该首先爱生活。”伊凡说:“爱生活本身甚于爱它的意义,是这样么?”阿辽沙回答:“一定要这样。应该首先去爱,而不去管什么逻辑,那时候才能明了它的意义。”长老教导人们要生活,并要阿辽沙走出修道院,走入民间,与人民一起生活,也意味着要他与人民一起承受苦难。

阿辽沙是在经历了现实的诘难后领悟了,上帝不存于教堂里,不存在于神迹里,而在活生生的生活里,在人的生命里,所以他说要活出爱来!人要怀着爱生活下去!这样生活才有意义,人才有价值,人类才有希望!这是阿辽沙的感悟,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悟。《圣经》上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圣经·约翰福音》,13:34)“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要爱人如己。”(《圣经·马太福音》,22:34)神爱世人,上帝即爱。上帝存在,人心中才有爱,有爱人与人才能沟通与交流,有爱人才会有悲悯;上帝存在,人类伦理才有绝对标准,人的心灵中才有道德律,人性才得以规范;上帝存在,人在苦难中有希望,有希望才有勇气。上帝存在的意义就在于给人希望,给人选择的自由,给人生存的意义,使人悔改,让人得救。反之,如果没有爱,世界将是人与人互

相残杀的人间地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且确实真理与基督毫不相干，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sup>[1]</sup>（第297页）

自然，与超验的上帝相遇，不能靠人的理性思辨，而只能靠人的觉悟与体认，靠忠诚的信仰与爱的实践。《约伯记》中上帝以创世的伟大使约伯信服被造的、有限的人类不能认识无限的上帝之存在，就已否定了理性认识上帝存在之可能；《圣经·诗篇》（卷四，第九十二篇）说：“耶和華啊！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畜类人不晓得，愚頑人也不明白。”这更进一步否定了人靠自身力量达到认识目的的可能性。理性无能为力的地方只能靠信仰去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经过痛苦的怀疑思辨之后，认同了《圣经》的启示。但这却不是简单的认同，而是经过了痛苦的思索之后的认同。所以他说：“我不是像小孩子那样信奉基督并宣扬他，我的颂扬是经过怀疑的巨大考验的。”<sup>[1]</sup>（第390页）经过质疑考验的真理具有不可抗拒的巨大力量。

上帝的存在问题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无论信仰还是不信仰，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它。上帝作为超现实的道德准则，是判断人类行为的依据；上帝作为至善至美的体现，是提升人类精神向上的动力。生活于罪恶现实中的人无论善与恶都需要上帝给予生存意义的解说，而上帝的存在又是一个无法证明的事实。所以，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善与恶、爱与恨、目的与手段、权利与责任等问题，人类如何得救的问题将继续讨论下去。困惑是永远的。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必须在信与不信之间作出选择，这不是上帝对人的考验，而是上帝赋予人的自由。真理不要求盲从。认识上帝之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认识上帝不是一种简单的认知，而是要经过个体的体认与觉悟。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上帝存在的思考是在人类的苦难之上展开的。人既然带着原罪降临人间，恶的存在就不可避免。苦难是人生的原生态，是人的宿命。人可以逃避环境，但无法逃避自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犯罪、苦难具有人的生存意义上的普遍性，原因就在于恶植根于人的本性；任何社会制度都会有恶，有犯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写出了人的生存状态与无可逃避的悲剧困境。也就是说，世界的苦难是永恒的。因此，上帝在给人选择自由的同时，也同时赋予了人向善的能力与愿望，人生就是一个善与恶搏斗的过程。在苦难的世界中，人只能信靠上帝，否则便会陷入永劫。小说中的人，无论是无神论者伊凡、弑父的斯美尔佳科夫，还是私欲熏心的德米特里，不管他们犯了什么罪过，都对上帝存在的问题作出了回应。有回应说明人内心存在着向善的可能。伊凡发疯了，斯美尔佳科夫自杀了，德米特里忏悔了，都是这种可能性的有力证明，而这正是人的希望之所在。正因为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对这些人的行为与思想进行否定的同时，也寄予他们悲悯与同情。他悲悯那些恶人陷入欲望的泥淖不能自拔，他同情那些思想者因迷失正途而遭受痛苦；他以阿辽沙背负十字架勇敢前行的行为彰显上帝的伟大，为世人树立榜样，期望人们通过道德实践获得拯救，从而改良社会。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白，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有人选择善，也有人会选择恶，这是人性使然，历史必然。但是，只要我们与上帝同行，人类就有希望！这应该是陀氏小说给我们的最大启迪。

综上所述，《卡拉马佐夫兄弟》记录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人生的困惑与思考，反映了19世纪俄罗斯社会最深刻的精神危机与心灵焦虑以及寻求精神家园的苦恼。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创作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困惑，他通过创作实现了自我拯救。他在困惑中寻求上帝的心路历程，在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中激起了极大反响，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永恒的世界意义。

#### 参考文献：

- [1]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M]. 冯增义，徐振亚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
- [2] 汪建钊编选. 别尔嘉耶夫集[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 [3] 张百春. 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 [4] 汪建钊. 编者前言：人的精神拯救[A]. 汪建钊编选. 别尔嘉耶夫集[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1-16.
- [5] 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 白春仁，顾亚铃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责任编辑：苑 涛）